

A Cultural Study of Cyber English Neologisms

文化视野中的网络英语新词汇

刘柯兰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A Cultural Study
of Cyber English Neologisms*

文化视野中的网络英语新词汇

刘柯兰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视野中的网络英语新词汇/刘柯兰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307-15493-3

I. 文… II. 刘… III. 计算机网络—英语—新词语—研究
IV. H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6994 号

责任编辑:罗晓华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14 字数:198 千字 插页:1

版次: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5493-3 定价:28.00 元

前　　言

英语新词汇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语言作为民族社会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承载传递媒介。伴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新词，并赋予新词丰富的文化内涵。

对新词的研究历来是国内外语言学家关注的热点。国外对新词的研究基本与英语词典的编纂同步，真正对新词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20 世纪 70 年代迅速发展。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研究方法不断完善。到 21 世纪更是突飞猛进，其特点是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和出版商直接在网上开辟新词网址，让用户直接贡献新词，共同探讨新词的用法和意义，因而各类英语新词典的出版更新很快。

国内以往的研究大多只关注英语或汉语的某一类或几类新词，进行新词对比研究的成果很少。即使后来有些学者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也主要是从词汇学、语义学及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比较英汉新词的产生途径、构词方式和语义特征的异同，鲜见从文化层面来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缺乏对相应的深层文化底蕴的观照。而这正是本研究的理论意义所在。从现实层面来看，新词的不断增长既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又促进了文化全球化。英语和汉语是当今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在文化视野中进行英汉新词对比研究，不仅可以拓宽新词研究领域，而且可以从更高层次和更深意义上把握不断涌现出的新词汇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积淀，从而更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同时可以更清晰地了解东西方文化特征与社会发展动态，促进全球文化的交融；并将进一步启发人们的思维，对外语学习、外语教学、对外传播及英汉翻译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所探讨的文化，指 Snell-Hornby 诠释的广义范围的文化概

念；所研究的“新词”，特指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英语新词，以及原有词语在新文化下增添新义后形成的词语。作者先从文化视角探讨网络英语新词汇的构词特点及语义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网络英语新词汇产生的各种社会生活文化背景，阐明语言与文化的共生互存关系；指出网络语言新词汇的互相引进和借用，其实质就是不同文化的渗透与交融。纵观英语和汉语的发展，不断涌现的新词汇都在言说着社会的巨大变迁与东西方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本研究基本内容如下：1. 新词构建的文化心理情境。词汇的构词法表面上是词语产生与形成的方法，深层意义上其实是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的反映。英汉新词的构词法反映了当代中西不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2. 新词语义的文化特性。词语的语义蕴涵着某一民族所固有的或特定的传统和思想特征。英汉新词的语义特点忠实地体现了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发展，具有浓重的民族性和强烈的时代性。3. 英汉新词源起的文化共性。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变迁，新词源源不断产生。新词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体现了东西文化发展的共性。4. 全球化时代的英汉新词互借。新词的引进和翻译，以及英汉新词中越来越多直接使用对方新词和缩略语的现象，正表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而新词的引入和翻译也必将进一步促进这种交流。汉语对英语新词汇从形式到内容的借入，再现了英美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反之亦然。5. 文化变迁中的英汉新词发展趋势。“中式英语”的出现不仅体现了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语言的包容力和活力，而且是中国文化走向全球化的表征。正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所言：“中式英语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其产生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是中国文化话语权提高的表现。”英汉新词的发展，直接促进了中西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语言作为跨文化跨地域交流的窗口，将不同国家和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本研究的重点是：在全球化时代，英汉新词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何异同？不同势能文化的相互交往对新词产生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信息传播全球化，网络语言的兴起对新词的产生有何影响？这

些问题对于厘清英汉新词的起源都十分重要。英汉语言在何种文化背景下引进对方原词？这些引进的新词在异域文化背景下是否保留其原意？其间的异同又如何体现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这些问题对人们正确认识语言与文化的共生互存关系、领会不同文化之间的渗透和交融、预测未来新词发展走向非常重要。

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在研究内容上，以英汉新词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在文化领域内，从学理与实践两个层面考察英汉新词变迁反映的人类文化的个性和共性，这也是英汉新词研究的新视角。在研究方法上，以全球文化传播为根本，以语言发展规律为基础，通过大量的例证及文献资料，对新词的产生和发展做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并从外在构词方法到内在语义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提炼出文化视角下英汉新词规律，从而展望全球文化发展方向，是新词研究的一种新的尝试。

从文化视角对比英汉新词的构词特点和语义特征，是本研究的难点。因为前人有关新词构词特点和语义特征的相关研究做得比较多，而从文化视角切入，资料相对较少。要在形式上不落俗套，内容上突破创新，相对来说不是很容易。对此，特别感谢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及武汉大学出版社给了很宽松的时间和足够的条件，笔者可以充分地查找、收集、更新、整理第一手资料。也特别感谢参加了本书资料收集及部分章节初稿撰写的尹莽、陈文斌、熊平平、武文煜、潘硕、盛佳、邓亚平、邓居首、王雪敏、魏文静等同学！

“世人作梅词，下笔便俗。予试作一篇，乃知前言不妄耳。”怀揣良久，终在此樱花盛开之际，悄然呈上，以抛砖引玉，求教于大方。

刘柯兰

2015年3月于江城水果湖畔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网络英语新词汇的构词法	14
1. 1 灵活的构词法：开放包容的民族文化	14
1. 1. 1 外来词	15
1. 1. 2 创新词	20
1. 2 委婉的构词法：避讳求雅的民族文化	32
1. 3 缩略语：推崇简化的民族文化	39
1. 3. 1 词缀法	40
1. 3. 2 拼缀法	48
1. 3. 3 缩略法	54
第二章 网络英语新词汇的语义特点	66
2. 1 表达的简洁性：语义通俗易懂	66
2. 2 交流的时效性：语法规则模糊	76
2. 3 后现代性的张扬：语义幽默诙谐	80
2. 4 性别歧视的减少：中性词普及	81
第三章 网络英语新词汇的形成背景	84
3. 1 政治体制类新词	84
3. 1. 1 政治类英语新词的概念	85
3. 1. 2 政治类英语新词的来源	86
3. 1. 3 政治类英语新词的特点	89
3. 2 经济发展类新词	91

3.2.1 经济发展及全球化	92
3.2.2 网络经济的迅猛发展	97
3.2.3 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特殊影响	101
3.3 科技体育类新词	104
3.3.1 科技英语新词	104
3.3.2 体育英语新词	115
3.4 社会生活类新词	120
3.4.1 休闲娱乐	121
3.4.2 社会理念	124
3.4.3 社会现象	127
 第四章 网络英语新词汇的引进	133
4.1 汉语对英语新词构词方式的借鉴	135
4.1.1 网络英语新词汇构词方式浅析	136
4.1.2 从文化视角考察汉语对英语新词的借鉴	141
4.2 网络英语新词汇的汉译	149
4.2.1 网络英语新词汇汉译的方法及定名原则	150
4.2.2 网络英语新词的汉译语用功能分析	155
4.2.3 网络英语新词汇汉译的必要性及禁忌问题	159
4.3 网络英语新词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交流	162
4.3.1 网络英语新词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163
4.3.2 网络英语新词与文化交流	165
 第五章 网络英语新词汇的发展	169
5.1 中式英语(Chinglish)的兴起：中国文化的输出	169
5.1.1 历史上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	174
5.1.2 中式英语被接受的过程	177
5.1.3 解析中式英语：中国文化的输出	183
5.2 汉英新词汇的超文本化：多元文化的相互交织	185
5.2.1 汉英新词汇的超文本化定义	185
5.2.2 汉英新词汇的超文本化产生的社会原因	188

5.2.3 汉英新词汇超文本化产生的文化解析： 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192
结语	196
参考文献	210

绪 论

中国有着很长的将文化研究和语言研究相结合的历史。例如，西汉扬雄的《方言》对共时方言的调查和记载，反映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尔雅》和《说文解字》中也包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

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国外早在 19 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开始了。应该说，最初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是人类学家。在外语教学界，美国和前苏联的教学法学家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明确提出，在外语教学中要对文化因素给予重视。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国要比西方晚，而且阐述得也不如西方系统和具体。把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研究，在西方大约有一百年的历史，在我国只有半个多世纪。早期，除汉学家马伯乐等人外，我国人类学家杨成志，民族学家罗香林、徐松石，哲学家张东荪等，都对汉语与汉文化的关系问题开始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论著。例如，杨成志的《广东人民文化史》、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张东荪的《知识和文化》，都有不少地方涉及语言与文化的内容，材料丰富，而且有一些独到的见解。^① 20 世纪 50 年代，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从词语的含义方面探讨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国内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的滥觞。继而兴起了多种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讨论，也产生了几个流派，如“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派”、“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派”和“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流派”以及多个学科分

^① 陈建民. 关于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思考[J]. 汉语学习, 1992(1).

支，如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方言语言学等。^① 尽管“一九五零年罗常培先生曾著有《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遗憾的是，这本书的出版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②。对语言与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并形成学科，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在语言与文化结合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际性工作，已初步缩小了与西方学术界在这方面的原有差距。在 20 世纪末，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的趋势逐步增强，后来又有人提出用跨文化交际规约代替交际文化。跨文化的研究也成为当前的热门课题。从发表的文章看，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已涉及双语双言及语言接触中的跨文化问题、外语教学与翻译中的跨文化问题，还涉及语言的类型学问题。语言与其他各种文化形态的研究也蓬勃开展起来，讨论语言与民俗、语言与宗教、语言与音乐的著述逐渐增多。曲彦斌《民俗语言学》(1980)等四五本专著的出版拓宽了语言与文化的研究范围。1994 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的“汉语修辞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对汉语与汉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随后出版的《汉语修辞与汉文化论集》是汉语与汉文化结合研究的成果集。^③ 1996 年在山东威海召开的“全国汉语和汉文化研讨会暨华东修辞学会第九届年会”也是以汉语与汉文化结合研究为主要议题的。

20 世纪以来，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国际间交流的日益增加使得文化交流深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也随之呈现出多角度、多领域的趋势。杨跃珍的《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看大学英语教学》(2007)、方伟平的《定义网络谐音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王军的《翻译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2007)、靳海涛的《从符号学的视角分析语言与文化的关系》(2012)等都反映出语言和文化关系研究范

① 魏丹霞. 我国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综述[J]. 考试周刊, 2011 (52).

② 周振鹤, 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③ 杨秋泽. 浅谈语言与文化的结合研究[J]. 修辞学习, 1997(5).

围的扩大。

一、相关研究领域(跨文化交际学、语言国情学、 文化语言学、语言文化学、语言-文化学、 对外汉语研究)

语言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文化是文化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语言与文化”则是建立在这两种学科基础上的交叉性研究，这种研究又因研究的角度、目的、对象和性质等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从而形成不同的边缘学科和研究领域：跨文化交际学、语言国情学、语言文化学、文化语言学、语言-文化学、对外汉语中语言和文化的研究。

跨文化交际学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于美国的一门边缘学科。20世纪60年代是跨文化交际学形成时期，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除人类学家外，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和教学法学家开始对语言与文化、文化与交际作深入研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跨文化交际学进入了成熟和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跨文化交际学有了更大的发展。跨文化交际学同人类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翻译学、传播学、外语教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①

在吴为善、严慧仙所著的《跨文化交际概论》中，跨文化交际是指在特定的交际情景中，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交际者使用同一种语言(母语或目的语)进行的口语交际。包含要点：(1)交际双方必须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2)交际双方必须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交际；(3)交际双方进行的是实时的口语交际；(4)交际双方进行的是直接的言语交际。^②

在跨文化交际学中，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是其最重要的基础理论

^① 吴国华. 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1997(5).

^② 吴为善, 严慧仙. 跨文化交际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10.

研究，为跨文化交际学提供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材料，成为跨文化交际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当今国际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如“双语问题”(Bilingualism)、“性别与语言”(Gender and Language)都成为跨文化交际学中探讨的问题。^①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得以迅速的发展，随着国家之间交往的密切，跨文化交际学中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也逐步由对语言学本身的研究转到以人为主体的研究中来。

语言国情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前苏联诞生的以研究词语民族文化语义为主要内容的学科，其核心是词汇背景理论。按照语言国情理论，词包括词位和义位两方面的内容。义位由概念义素和非概念义素构成，其中非概念义素又称背景义素，其总和为词汇背景。语言国情学对义素的理解超出了传统语义学对义素的理解。它把通过联想试验获得的与某词有关的(有逻辑联系的)并能反映该语言民族文化特点的非概念义素也归入了义素的范围。^②与美国兴起的跨文化交际学的侧重点不同，语言国情学研究的目的更侧重于外语教学。因此，有的学者直截了当地说，语言国情学是社会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具体反映。

语言文化学，是从语言入手，通过对语言现象和材料的观察分析，研究某一语言社团或民族的文化方面，以及语言对文化诸方面的影响和制约。我们可以从某一民族的语言去研究该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政治体制、思想情感、思维方式等。语言文化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输出的结论是关切文化的，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它属于文化学的范畴，或看作文化学的一个分支。这种研究并不对所有语言现象都感兴趣，它不理会那些与文化无多大联系的语言材料。^③

① 顾嘉祖. 语言与文化——永恒的跨学科研究课题[J]. 外语研究, 1998(4).

② 吴国华. 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回顾与瞻前[J].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1997(5).

③ 陈月明.“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J]. 汉语学习, 1993(2).

文化语言学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我国兴起的以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为主旨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属于语言学的范畴。文化语言学最早是美国学者帕尔默创建的年轻学科。它以认知语言学为框架，整合了语言人类学对文化和语言的研究。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与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文化语言学思潮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认知性和意象性。^① 语言学家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思考，使语言学研究不止于语言形式，而且也通过语言来研究一个民族文化的过去和将来。语言之中蕴涵着文化，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得益于语言。语言文化学是指从文化的角度去解释某一团体或民族的语言要素。例如从人口迁徙、民族交流、殖民统治等历史、文化因素研究一种语言或方言的发展形成过程，解释其中的一些现象或根据文化特征建立语言描写系统等。^②

语言-文化学是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它主张语言和文化二者是并列的，不主张语言包括文化或者文化囊括语言。它通过研究语言和文化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或结合，试图找出其中具有共性的地方，有着自身的研究目的。很难说语言-文化学属于哪一门学科，不管是文化学或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都与它们有交叉。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跟一些传统学科，如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生理学、社会学等，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它跟一些新兴学科，如计算机科学、通信工程科学、跨文化交际学等，也有密切关联。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由来已久，肇始于汉代，大兴于唐代。当时外国留学生、学问僧在国学肄业或在寺院习经法者多达数千。全球首家孔子学院于 2004 年在韩国首尔设立，在推广和传播汉文化的同时，也使得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除了语言的学习外，文化教学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讨论对外汉语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① 冷慧，董广才，李亚男. 认知语篇分析的文化语言学视角 [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1).

^② 陈月明.“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J]. 汉语学习，1993(2).

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有学者认为，讨论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要分阶段来研究。在不同的教学阶段，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不同的。基本上认为在初级阶段要以语言教学为主，文化教学为辅，同时文化教学内容为知识文化或称为物质文化，如“春节”、“贵姓”等当中包含的礼俗文化。在中高级阶段要加大文化的输入而且输入的是“交际文化”或称为“精神文化”，如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化可以在这个阶段介绍给学生，但要注意适量，在这个阶段也不能放松语言教学。这方面最新也是较为全面的研究成果是李枫(2010)的《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因素处理的阶段性划分》一文，文章比较完整地论述了文化因素分阶段处理的必要性、依据、原则和策略。除了提出一些宏观的策略方法外，在细节方面研究得还不够深入。

二、语言与文化的定义

了解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与相关研究领域后，要进一步弄清楚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楚语言和文化的定义。

人们对“文化”一词并不陌生，但是要给“文化”一词下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定义，绝非易事。从词源和语义上考察，“文化”一词是从拉丁语 Culture 转化而来的。其原义是指人在改造外部自然界使之适应于满足食住等需要的过程中，对土地的耕耘、加工和改良。后来，这一术语产生了转义，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在他的“智慧文化即哲学”这句名言中把文化的转义确切地表达出来了。^①汉语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意思是按照人文来进行教化。近、现代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文化经典定义是 1871 年由英语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泰勒的文化定义

^① 王威孚，朱磊. 关于对“文化”定义的综述[J]. 江淮论坛，2006(2).

只包括精神方面，还不够完整。现代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包括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和行为方面。^① 准确而完整的文化定义是：“文化是指一个社群的‘社会继承’，包括整个物质的人工制品（工具、武器、房屋、工作、仪式、政府办公以及再生产的场所、艺术品等），也包括各种精神产品（符号、思想、信仰、审美知觉、价值等各种系统），还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生活条件下以及代代相传的不断发展的各种活动中所创造的特殊行为方式（制度、集团、仪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等）。”^②

文化具有如下本质特征：（1）文化是经由社会习得的，而非遗传获得的；（2）文化是一个社团成员所共有的，而非某一个人所独有的；（3）文化具有象征性，语言是文化中最重要的象征系统；（4）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文化中的每一方面都和其他方面相互关联。^③

关于语言的定义，争议不大。“从语言的结构特征来看，语言是个符号系统，它是一个由音位、语素、词和词组、句子和篇章等构成的层级系统，从语言的功能特征来看，语言是个工具，是个思维的工具、交流的工具”^④。

一般来讲，语言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所用的一种符号系统，如汉语、英语，由语音、语法、词汇构成；另一方面，它指人们在交际过程中说出的话，写出的书信、文件、文章等。对于语言的定义，我们也要把“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言语是指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一种社会活动，也是人类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它与其他的人类行为活动一样，既是个人的，又是社

^① 况新华，曾剑平.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述要[J]. 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

^② Bullock A. & Stallybrass, O. (eds). 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M]. London: Fontana, 1982: 150.

^③ [美]威廉·A. 哈维兰. 当代人类学[M]. 王铭铭,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242-248.

^④ 束定芳. 语言与文化关系以及外语基础阶段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J]. 外语界, 1996(1).

会的，因而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倾向性，从而形成一定规范模式和一定的习惯程式。因此，言语-文化研究主要是研究言语活动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也可以在语言社团内部的言语行为差异与亚文化的关系上进行。^①

三、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学界提出过多种观点，代表性的有“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结构是文化结构的本源和决定因素；与之相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文化结构是语言的决定因素；格里姆肖的“社会语言学”则认为语言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互限”；乔姆斯基的学说认为语言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都是受第三种因素诸如人的本质、人脑结构、人类思维特征等决定的；实证主义则认为，语言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之间只有“伙伴关系”、相关关系，而无因果关系。此外还有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说，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工具说，语言与文化的基本特征一致说等。^② 根据这些学者的观点，我们按照语言与文化的主导性大致可以把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分为四种类型：语言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第三者决定论、相互影响决定论。

(一) 语言决定论

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萨丕尔和沃尔夫基于思维结构与语言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提出了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该假说认为，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必定会受到所使用的语言的影响，并把两个原则结合起来：“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ation)，即认为语言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① 陈月明.“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J]. 汉语学习, 1993(2).

② 于桂梅. 从汉语词汇看文化与语言的关系[J].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10(4).